

百感交集忆回国六十周年

□ 口述:黄丁兰(印尼归侨)

我是旅居印尼的第五代侨生,祖籍福建南安。1939年出生在印尼西爪哇井里汶芝日洛镇,家里经营布业生意,家境尚算殷实。我童年时寄宿在万隆姑妈家,自幼在荷语学校接受荷兰教育。

1958年我考取印尼国立巴查查兰大学(Padjadjaran University),可是这所公立大学因为我是中国国籍而拒绝了我。后来无奈改读天主教勃良安大学(印尼文校名是Universitas Katolik Parahiangan)

的经济学专业。该校授课语言是荷兰语与英语,这也使我在大学期间便掌握了影响我人生道路的一门生活技能。

家父黄良珍会一些中文,谈不上很好,但他是镇上热心华文教育的侨领,曾多次出席欢迎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尼的座谈会;曾应邀赴京,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赏国庆10周年阅兵大典。我在万隆读书时,父亲每周都要坐3个小时的车来看我,他常跟我念叨“不要忘了中国”。

丛书《印尼》一书,撰写了《印尼和中国粮食增长的启示》等多篇论文。因荷文人才奇缺,厦门市政府和涉密的有关部门所需的译件,非我莫属。

1989年至1990年我幸运地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进行学术交流。回国后,我还曾为庄国土教授所译的荷文《荷兰华人的社会地位》一书的第二章、第三章进行校订。我能在祖国的识才启用和栽培下,尽自己微薄之力,为南洋历史研究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,深感欣慰。

退休后多次为荷兰籍来华寻根华裔翻译先人的各种文件和信件,由荷语译成中文后,无偿提供给有关接待人员。寻根的华裔提供的那些旧资料往往都很深奥,或是语焉不详,我要去查资料,去翻历史书,不懂那些知识就没法读懂老旧的证书、信件等。

人生如梦,回国一晃就送别了60个春夏秋冬。回顾峥嵘岁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被派参加“社教运动”,在南安丰洲镇和农民“三共同”接受再教育,还曾先后参加曾

厝垵、集美厦大农场务农,饿筋骨,炼心志,感受改变人生轨迹的甜酸苦辣。特别是刚被派去参加“社教运动”时,孩子才4个月,还在吃奶呢。那时我在厦大南洋研究所工作,一个月工资才40元,在厦大食堂天天吃空心菜、海带,有个豆腐都已经算是加菜了。我有3个儿子,经济上很紧张,父亲按每个孙子每月10元的标准寄来侨汇。

除了文革期间,父亲差不

多每四年回中国看望我们,那时中国还比较贫困,他和无数海外华侨一样,每次回来都大包小包,带来了电视机、自行车、录音机和奶粉等物品。他在上海有投资。而今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,真的不能忘记侨胞曾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。

1970年代,我的兄弟们陆续去了香港、巴西、新加坡、美国,就我一人留在中国。原因嘛,一个是我爱人是党员,不能出国定居;另一个是我也不想离开。



回国前在芝日洛与父母家人依依不舍



2006年9月厦大南洋研究院50周年院庆与全体同仁合影

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50周年院庆 2006.9.12

1959年底,苏加诺颁布排华《总统第10号法令》,厄运降临。1960年3月我乘上祖国的接侨船,从广东湛江踏上祖国大地,后辗转抵达上海,寓居早年从印尼回国求学的二哥家里。

我们兄弟姐妹8个,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先回了国,我和两位弟弟一起被迫离开亲爱的父母、大姐以及养育我成长的印尼国土。幸而哥哥们已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。在此后的岁月里,父母兄长给了我无数亲情的慰藉和经济上的帮助。

正当我为前途犯愁时,喜从天降,经上海市侨联引荐,中侨委派两位司长考核我的外文水平,我顺利过关。次日

(1960年6月26日)由他们陪同直奔厦门大学,安排在中侨委属下的南洋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。由于我当时的汉语水平几乎是零起点,听、说都不怎么会,我的工作便是将文献资料由英文或荷兰文译成印尼文,再由同仁译成中文,并为从事编写《印尼华侨史》的研究人员提供大量资料。期间领导要我一边搞翻译,一边扫盲学中文。经单独授课和语言环境的耳濡目染,我较快地提高了中文的听说能力。

1973年至1974年,领导派我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。回厦大后,除了原有的翻译工作,我还从事研究印尼的工作,参与编写东南亚系列

我于1994年退休,我在南洋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印尼组工作了34年,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。

退休后,我任厦门印联会厦大联络组组长,配合印联会根据厦大小组的特色组织联谊活动;克服自身年迈体弱、

组员居住分散等许多困难,尽力和组员相互关爱,转达市侨联和印联会组织的温暖。

昔日往事至今历历在目,可谓百感交集:印尼排华是祸,投奔祖国走上造福之路,因祸得福!真切地感恩我们的党。共和国崛起誉满天下,我

们归侨为之自豪;尤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“抗疫”壮举,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,震撼世界,惊天地泣鬼神!

而今我步入了耄耋之年,子孙满堂。老伴也是厦大的退休教师,我们的生活很安逸,每天早上7点前到厦大法学院篮球场打太极拳、舞剑、聊天。大儿子一家在厦门,二儿子一家在香港,小儿子一家在美国。我们有5个可爱的孙子。

国家为我提供了优质的生活条件,为我的子孙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,我们享受无忧无虑的温馨生活,深得海外亲人的羡慕和祝福。值此纪念回国60周年之际,我深深庆幸此生叶落归根,来世愿播种在华夏。



全家福

默默无闻的丁兰姐姐

□ 口述:陈有理(印尼归侨)

黄丁兰是位非常优秀的女士,我回国踏上厦门的第一天,那时是1961年6月,就是她负责接待我们家的,因为她懂得荷兰语。黄老师看着我长大,我称呼她“丁兰姐姐”,她是位非常和蔼的长辈。

我在厦大侨联工作了16年,组织活动忙不过来的时候,黄老师总是一马当先地跑来帮忙。

我退休后,因思明区侨联工作需要,帮助接待海外华侨华人。我的荷兰文水平远远

不如黄丁兰,那是她的母语,不懂的地方,我就跑去向她请教,特别是母亲去世之后。

我了解到,有一组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史料,非常珍贵。说的是吴仲汉先生的父亲吴云灿在印尼组织了支援祖国抗日基金会。买了4部救护车,派出23名医生,奔赴长沙和武汉,为八路军送药。日本侵略印尼时期,这个家族失去了所有的照片,而这段历史在国内几乎是空白。

我在带领吴仲汉等人参观华侨博物院时,他们非常惊喜地发现,有张“救护车”的照

片就挂在展厅的墙上!这种“失而复得”的感觉怎不令他们惊喜得几乎要落泪!华侨博物院的摄影师陈永宗连夜复制了这张照片送给他们。从此我和这个家族就一直有联系,后来他们就想来中国寻根。

我想把这组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史料引回国内,但这些史料是印尼文、荷兰文写的,其中不少还是古荷兰文,我看不明白或是无法准确把握。于是我拜黄丁兰为师。她年老体衰,家务事多,印联会的工作也多,但我每次到她家请教,她都放下手头的工

作,拿出字典,非常耐心地讲解给我听。

我翻译出初稿后,发邮件给黄老师,请她审核。没想到的是,她家的电脑老旧,她又不会打印,就一字一字地先从电脑上抄下来,再逐字修改、批注,然后到邮局邮寄给我。我真是太感动了,我也非常后悔,早知道这样我就该把文稿打印出来,送呈黄老师,可以省她很多时间。在她的帮助下,初稿基本翻译完工,送给了华侨博物院。

丁兰姐姐做这些事情都是义务的,她也从不声张。

任劳任怨的幕后工作者

□ 口述:陈裕秀(印尼归侨)

印联会厦大组组长的工作是蛮辛苦的,但丁兰从来都是闷头干活。聚餐活动时,挨个通知、联系。会员生病,她到医院、家里问寒问暖;会员去世,特地到火葬场送行。特别是这几年,厦大老归侨纷纷搬出厦大随子女居住,她自己已经过八十了,还是坐公交车把过节的票券、慰问的费用及物品,挨家送到他们手上。她自己年纪这么大了,身体也不好,能够这样做,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

本版文字采访整理:林希